

小泽退党将日政局拽入战国时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刘军红



6月26日,日本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在国会上率部造反,对野田政府主导的“一体化改革法案”投了反对票,由此拉开了日本民主党分裂的序幕。此后,小泽所部造反议员集体脱党。7月8日,小泽又扬言将聚集国会参众两院50名成员组建新党。日本政局闹地震,野田执政结构动摇且堪忧。

小泽脱党的直接诱因,是反对野田领导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和公明党达成妥协、联合推出一体化改革等相关法案。一体化改革法案核心是提高消费税率,该法案规定,2014年将现行的消费税率由5%提高到8%,2015年进一步提至

10%,目的是缓解社保财源不足。而小泽认为,这与2009年日本民主党竞选时向选民承诺的任内不提高消费税相背。

事实上,小泽投反对票的意图不在否决法案,而在于表明政治姿态。正如他在投票后长出一口气,连三自言自语“好了、好了、好了”。言外之意是终于下定了与野田对决的决心。

今年9月是日本民主党与自民党两大政党的党代会会期,届时两大政党将同时面对换届选举。明年则是民主党本届政权的最后一年,能否保住政权,关乎民主党的政治生命。而对于野田而言,能否在9月的民主党党代会确保党首位置,并确保连续执政,更是他本人政治生涯的更高追求。为此,野田选择与自民、公明两大在野党合作,力推消费税率改革,赢取政治资本,确保党政连任。

小泽造反,打乱了野田的战略部署,使野田的长期执政构想充满不确定性,日本政局更加盘根错节,政治方向进入新的不明期。

首先,小泽造反,打破了民主党“夺权政党”体制。2003年小泽摧毁亲手组建的自由党,加入

民主党,并历经近六年苦斗,将民主党推上执政宝座,民主党事实上演变为“夺权政党”。而民主党执政后,并未依据执政需要展开大规模的政党改造,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夺权政党”体制,大政方向不明,党内夺权意识上升,内耗不断,政纲难遂。此次,小泽造反,促成了民主党的“夺权政党体制”断裂,但也极大削弱了民主党的执政实力。今后,野田能否有余力推进党建改革,充满变数。

其次,小泽造反,动摇了三党合作的基础。小泽率部脱离民主党后,尽管野田使出撒手锏,对脱党者实施“追加开除党籍”处分,威胁造反帮在今后的大选中沦为没有“政党公认”的孤儿,以至于部分小泽帮撤回离党申请,但野田体制的内伤不轻,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夺权势力抬头,直逼9月民主党党代会。尤其是小泽造反后,自民和公明党都表示围绕“一体化改革法案”的联合基础动摇,意味着对野田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的怀疑,表现了要乘势推动大选,再定乾坤的政治姿态。

其三,小泽造反,标志着日本政党政治再临

多党林立新时局。近日,小泽加快筹建新党步伐,其创始党员数量约达50人,在众院堪称“第三势力”。严重的是,在战后日本政党史上,小泽曾制造三次造反,组党并迅速繁殖成大党的战绩。而每次建党初期,创始成员都是只有50人左右,几年之后便迅速繁殖到200余人的大党。与此同时,大阪、名古屋和东京等地方党团势力急剧上升,对国政都表示跃跃欲试姿态,多党林立格局呼之欲出,两大政党体制恐将面临新危机。

而在政党理念和国家战略上不能忽视的是,野田执政以来,民主党快速向大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利益代言人方向转变,政策基调直接反映大资本的战略利益:如提高消费税率、推进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乃至控制亚洲市场、主导亚洲秩序、掌控亚洲金融货币生命线,促进基础设施、核电站、环保设备出口等等。而地震后的复兴计划、人口老龄化下的医疗保障体制等涉及民生的大事,至今尚未纳入野田的政治日程。如此政治失衡,显然成为野田维持稳定的长期执政的难题,也是小泽造反的深层动因。

中美将就“22起双反措施 世贸争端一案”进行磋商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商务部获悉,中美两国将于7月18日至19日,就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起诉美国对华22类产品的反补贴措施一案进行正式磋商。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李成钢向记者表示,此案涉案金额高达72.86亿美元,反映了美方在贸易救济方面长期以来违反WTO规则的事实。

据他介绍,美方是在WTO框架下被诉最多的成员,被诉案件116起,其中贸易救济措施被诉60余起。除了中国以外,欧盟、日本、韩国、越南、印尼等成员方都就美方的双反措施提出过诉讼。



叙利亚海军实弹军演

这张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SANA)7月7日公布的照片显示叙利亚海军参加实弹军事演习。

叙利亚海军7日在所属海域举行了实弹军事演习,演习中出动了直升机和导弹艇,并发射了导弹,模拟在海上遇袭情况下如何击退敌方入侵。

□新华社/法新

澳德日摸索推迟退休年龄

养老金缺口,如今已经是世界性难题,因为人口越来越少,供养退休人口变得越来越吃力。在国外,推迟退休年龄的确是一种趋势,很多国家以此作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办法之一。不过,推迟退休年龄对于解决养老金缺口,并未起到根本性作用。

澳洲:能力有限者才能提前退休

彼得在澳政府工作多年,今年51岁,他的愿望是55岁提前退休,然后周游世界。但令他不快的是,从去年5月开始,澳大利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逐年递增。甚至到2023年,年满67岁才可领取养老金,这意味着67岁以前,必须要工作或靠投资维生。

澳养老金退休年龄于1909年制定,而在此期间澳洲人的预期寿命已经延长23年之久。根据现行政策,到2017年期间,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上涨到65岁零6个月,到2023年将最终提升到67岁。

澳法律严格规定私营雇主要向雇员支付养老金,在其税前工资中占比9%,并且至少每三个月存入员工养老金账户中。

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养老保障,就是政府向无收入者或低收入者提供支持基本生活的养老补助。法律规定申请者需要提供足够证据来

证明自己确实经济或工作能力有限。

德国:工作的供养退休的

家里刚迎来第二个孩子,居住在德国很多年的杨先生,欣喜中夹杂着些许愤怒和不满,“我的邻居是一对没有要孩子的夫妇,他们的生活质量能得到有效保证,而我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到时候参加工作后还要养活退休后的邻居!”

杨先生说正是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德国养老体系由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自愿保险等多种形式组成。其中法定养老保险是政府强制保险,也是覆盖人群范围最广的养老形式。

由于德国养老金系统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方式,并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将养老金以储蓄形式放在账户累积,因此人们将德国的养老体系形象地称为“工作的一代人供养退休的一代人。”杨先生说他自己目前每月收入有近10%是交了养老金,然后单位还会再支付同等金额,此外加上国家每年的财政补贴,就构成每年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总额。尽管从理论上说,退休后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和自己工作时交养老金的年限、数额有直接关系,但总额多少是由人们交的养老金决定的,因此,杨先生对自己退休后能拿多少



养老金,能否保证退休后的生活质量等问题一无所知。

据德国当地媒体报道预计,到2030年将由每2个人供养一个退休老人。德国政府规定从今年1月1日开始,退休年龄将逐渐从之前的65岁提高到67岁,预计未来退休年龄还会上升。

日本:提前退休养老金减额

日本国内所有20~60岁的人都要参加“国民

年金”,“年金”也就是中国的“养老金”。除全民参加的国民年金外,“厚生年金”则是日本企业职工加入的公共年金,共济年金则针对公务员和私立学校教职员。

对于“国民年金”,原则上居民65岁以后,可以获得“老龄给付”(支付给个人的养老金)。如果一定要在60岁提前开始领取养老金,那么能够领取的养老金按提前月数,每月将被减额0.5%。

从国民年金制度创立初期,就定为从65岁开始领取。而1944年日本最初制定《厚生年金保险法》时,规定男女都是从55岁领取厚生年金,几经修改,也提高到65岁。

早在2000年修改《老年人雇用安定法》时,只是建议企业延长雇佣期,而2006年修改后,则成为强制性的义务,规定企业应采取保护措施,无条件确保雇佣年龄至65岁。去年10月,厚生劳动省提出将国民年金的领取年龄进一步提高到68~70岁。

这个法律实际推迟了退休年龄,也将引发增加企业负担,影响年轻人就业、削弱企业创新力等问题。如在日华人创办的中国通讯社营业部部长姜德春说:“解决高龄社会的养老金问题相当棘手,决不是仅仅靠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所能对应的,必须要从社会福利的全局和国民所得的再分配等方面统筹考虑。”(据新华网)

大众时评

深圳养老保险改革的进步与局限

□ 邓子庆

一直饱受社会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有望在深圳市破冰。通过新一期深圳市政府公报公布的《深圳市2012年改革计划》显示,今年深圳将力推22个改革项目,其中包括研究探索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既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又体现公务员职业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7月6日《深圳特区报》)

长期以来,公务员不用缴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拿到相对丰厚的养老金,基于这种被公众普遍诟病的现实,深圳市让公务员也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这种破冰之举,不仅对充实国家养老保险基金有着积极作用,其在维护社会公平平等上,也体现出重要价值,着实值得期待。当然,还得提

醒的是,公务员缴纳养老保险,仅仅是破除中国养老金双轨制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民众期待的养老金“单轨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应当注意到,此次深圳市让缴纳养老保险的公务员,并不是所有公务员,而是仅指“聘用制公务员”。事实上,目前深圳市聘用制公务员仅有1800余名,即便这部分公务员全部参加缴纳养老保险,于庞大的非聘用制公务员队伍面前,其所能起到的作用恐怕已是相当微弱。

更何况,往深里讲,聘任制公务员本来就应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要知道,所谓聘任制公务员,是经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按合同

的方式聘用而产生,合同期一般1-5年,说白了,聘任制公务员就是合同工,其职业就是为“国家公司”打工,这种企业化模式之下,聘任制公务员也当与广大国企或私企员工一样,缴纳社会养老保险。

特别是,深圳在此次试点中仅仅提及公务员要缴纳养老保险之事,而未提及养老金领取中的双轨制,而事实上,养老金双轨制为民众所诟病的关键正在结果的不公平上。长期以来,我国的养老制度在设计 and 执行上形成了多轨制,造成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企业员工和社会个体劳动者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公务员不交养老金,退休后却能领到工资替代率达80%左右的养老金,

公务员群体比事业单位的额度还稍高一些,而企业员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只有45%左右。如果这一局面不改变,即便深圳的聘用制公务员都缴纳养老保险,但其未来的退休金依然高出企业员工。说白了,深圳市在试图改变养老金双轨制的试点过程中,顶多不过做到了部分人的起点公平,至于结果上的“双轨制”,仍然有待破冰。

总而言之,深圳试点让聘用制公务员缴纳养老保险仅仅是破除养老金双轨制的第一步,这一步虽然较小,但也不失为统率性、关键性和突破性的一步。当然,若要真正破除养老金双轨制,还得让所有公务员都一视同仁地缴纳养老保险,更得切实从“结果”上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网声

篡改高考志愿 不能“还原”了事

近日,四川眉山市万胜高中10余名学生发现自己的高考志愿被修改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招办负责人称,如考生志愿被恶意篡改,将恢复为原始志愿,并处理相关人员。篡改高考志愿,岂能“还原”了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暴露出了在考生志愿填报期间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既然漏洞已经出来了,有关部门就应当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制定更加严密的管理制度,严厉打击篡改考生志愿的违法犯罪行为,切断一只只伸向考生的“黑手”,保障考生的合法权利不被任意践踏。

“直播面试”不是招考公正的终点

日前,湖北省对2012年省直机关公开招聘公务员进行集中面试。其中两个职位的面试进行了公开直播。尽管电视直播使“公开、公平、公正”的步伐大大向前推进,但这并不是招考公正的终点。虽然直播使公众拥有了知情权,但并不等于拥有了监督权。只有公众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相对集中、合理的意见对招考结果有实际影响力时,直播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否则,只能是形式大于实效,直播可能变为“面试秀”。

牛奶更安全乃公众利益所系

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为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设定了新标准,我国的标准由此成为关注焦点。让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含量更低是大势,让牛奶更安全乃是公众利益所系。民众有在牛奶等食品标准上看齐国际标准的巨大动力和消费诉求。从国家到企业,都有责任提高牛奶安全标准,让民众对牛奶放心。不管此次牛奶中三聚氰胺含量标准之争真相如何,国产奶业都不妨以此为契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升级换代。

“样板工程”坍塌的“样板教训”

7月2日,杭州德胜东路一跨座线桥在拆除时突然坍塌,酿成一死三伤的惨祸,该拆除工程曾被评为“标准化工地”。轰然坍塌的“样板工程”,实际上提供了某种“样板教训”。一方面,荣誉和口碑不是免检证书,工程建设不能迷信“样板”和典型,即便是荣誉满身的施工单位或工程项目,也必须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施工;另一方面,各种工程建设的奖项评定、资质认定不能失之于滥,不论专业机构还是政府部门,都不能随意透支自身公信力,更不能将评定“样板工程”的工作变成寻租机会。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问题异见

招生录取该不该“男女有别”

漫画/卢鹏

“男女有别”是人性化的体现

□ 秋风落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有“重男轻女”之嫌,但细细品味,却感觉校方有人性化的考虑在里面,“男女有别”并不是男女歧视,对这种做法先不要急于“拍板子”,可以站在校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下。

作为语言类课程,从生理学上来讲,女孩具有先天性优势,正如女孩在工科类课程方面具有先天性优势一样。女孩学得语言比男孩早,思维方式偏于形象思维,擅长于机械记忆与形象记忆,而男孩思维方式偏于逻辑思维,擅长于理解记忆与抽象记忆,相比较而言,女性更适用于语言类课程的学习。但是社会不仅需要女性语言工作者,有时候也必须需要男性语言工作者,如果因为在招考过程采取片面的分数一刀切,男性在与女性的竞争中失去很多机会,从表面上看,是公平合理,但对社会发展长远不利。

作为一个学校而言,也要讲究性别比例。如果工科专业全部是男生,语言类专业全部是



女生,这样容易造成一种思维的僵化,毕竟男女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语言类专业也需要逻辑思维,工科类专业也需要形象思维,片面的单一化,不利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对一个班级而言,男女的比例协调有利于促进男女之间的交流,有利于个人价值观、幸福观的塑造。

以笔者看,“男女有别”并非男女歧视,而是校方从人性化角度作出的现实考量,值得肯定。

“男女有别”是性别歧视

□ 钱凤伟

日前,根据人民大学招办公布的录取结果,今年人大首次在提前批小语种录取时,区别男女划分数线。

不知道“男女有别”是出于何种考虑。常识告诉我们,这与小语种的学习和掌握无关,也与今后的就业无关,许多小语种的翻译和研究,不乏女性乃至优秀的女性。换言之,小语种的招生,根本就不应该“男女有别”。

对女生更加苛刻的录取分数,无疑降低了女生的录取概率,许多女生,有可能因此失去了学习和深造的机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这显然侵害了女生的权益,对女生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学校也没有权力,来制订和实行如此“男女有别”的招生办法。《教育

法》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也因此,于就读人大,男生和女生有着平等的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学校的任何做法,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或许,人大区别男女划分数线,是为了就读男生和女生,保持一个大致平衡的比例,但这显然不应以剥夺女生的平等权利为代价。实际上,也只有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才能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衡。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深层次上说,折射出的是国人性别歧视的观念。而千百年来,尤其对女性的歧视,更是根深蒂固。也因此,即使是堂堂高等学府,一不留神,就背离现代文明,侵害女生平等权利,而且是如此的随意。